

《與談》

政治認同困境 「綁架」兩岸關係

◎陳文茜

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題目，大題目的壞處是很難在短篇幅中，把客觀事實完整地寫出來，但是它也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在面對台灣政治現實之際，必須抓出一個正在發展的主軸。我想，討論一個大題目必然要尋求一種簡化的方式，因而有些論述難免會有被簡化的現象，但是根據我的觀察，二〇〇四總統大選前後，面臨不同選舉結果，在兩岸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衝擊下，國家會有幾項必然且不可逃避的重大議案。

不敢攤牌不甘投降的兩岸關係

首先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，回顧過去十年的兩岸關係。簡言之，我認為兩岸關係就是「不敢也不能攤牌，但又不甘願投降」，亦即在台灣大多數民眾的認知裡，政府不敢也沒有能力以戰爭解決兩岸問題，可是它也不甘願一步步退讓，直到接受一國兩制、一中原則。於是過去十年來，台灣始終處於擺盪的過程，每次有人不斷往前逼，逼到戰爭前夕，我們就會立刻翻牌往後退，但是退到一個階段，又會再次向前逼，形成不斷的辯證、變動。所以幾十年來，兩岸關係的變化似乎很大，但其實永遠都跑不出一定的範圍，也形成固定的模式。

從九二共識到今天，在這個模式之下，最重要的變化應屬台灣本地政治認同的改變，也就是說兩岸關係沒有改變，可是台灣本地的認同現象出現改變。截至目前為止，民調結果指出全台灣的外省人佔十二%至十五%，可是全台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剩下九%，這和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代的民調數字不一樣，那時候的主流民意相當穩定，多半民眾認為自己即「中國人」或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」，然而現在認為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」佔四十二%、認為自己是「台灣人」佔三十八%，而認為自己「完全是中國人」只剩九%。換句話說，十年來，包括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，真正發生基礎改變的是本地的認同結構，兩岸關係其實沒有改變。如同我曾經計算過，陳水扁在今年一月之前，曾經說過十二

次要直航、七次不要直航，每一個主張他都有所表示，我們當然可以譏笑這樣缺乏公信力的總統，但是不如去觀察他所呈現出來的滑動現象，也就是我們十幾年來，沒有人願意去道破的兩岸現象。

我認為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大選，意義在於台灣是要做出一個選擇：你選擇在未來和中國是一個「全面的衝突關係」，抑或是一個「不高興的妥協關係」。對台灣而言，這個問題更嚴肅的面向是——今天的中國代表世界；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，當你選擇和中國衝突，等於是和世界的政經發展衝突，譬如我們提出防禦性公投後，面對的處境即是如此。所以對台灣人來說，這場選舉是一個太多糾葛的符號，它把台灣本土認同和全球經濟都扯在一塊，然後又給我們一個非常寬廣的選擇。

執政色彩決定兩岸衝突性質

由於我的工作就在政治圈裡頭，請容許我作一些大膽的觀察。我覺得二〇〇四總統大選除代表著一個歷史性的選擇，兩岸其實也正面臨攤牌，包括中國北京國內的政治，和台灣自己的經濟處境，都在作全面的攤牌。

就台灣而言，剛剛提到高雄港排名的滑落，就是明顯的例子。從二〇〇〇年起，高雄港每年掉落一名，接連輸給韓國釜山、中國上海與深圳，我想只要再不直航，明後年會繼續掉到第七名、第八名，這是不必自欺欺人的事情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一個指標，亦即面對中國問題可以拖，但是經濟拖下去的結果，就是每年滑落，此外還有新的問題會產生。對此我大膽預言，如果連宋當選，台灣和中國大陸仍然會有衝突，而這是非主權性質的衝突；我相信連宋當選後，直航勢在必行，而且直航面臨的政治困擾會比現在少，直航的談判也會迅速許多，整個專業事務的法律細節，大概需要一年多至兩年規劃，因此最快在二〇〇四年底、二〇〇五年初可以海運直航，二〇〇五年底、二〇〇六年初可以空運直航。對台灣來說，一個遲來的直航，似乎可以將兩岸關係接軌上去，可是由於過去對直航的延遲，所以即使連宋快速解決直航問題，我們馬上也要面對與世界接軌帶來的衝擊，而這個衝擊就是預先準備不足。

此外進一步分析，直航在台灣有產業利益的差別，在國內有保護利益的產業都反對直航，譬如房地產業，但是有能力和世界接軌的行業都贊成直航，譬如高科技的空運成本即可因直航而節省三成左右。為什麼擔心房地產業對直航產生的效應？因為台灣所有從事土地開發的人，都是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人，也就是過去在地方派系、媒體介入極深，並在

很多不同的行業裡頭，他們可以作最有效的政治遊說。不過這些行業本身在台灣的產業價值、附加價值非常低，而它對銀行留下的呆帳、對金融的影響、對立法院的政治遊說、對各政黨的地方政治生態，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量。就此而言，倘若連宋當選之後，即使直航勢在必行，也等於是變成被動的趕鴨子上架，原本應該作些相關的準備、配套，避免產業過度受傷，卻可能來不及，於是民眾看兩岸關係好像出現了曙光，但是宣佈直航的政府，其實立刻要面對國內非常嚴重的政治挑戰。

至於如果是陳水扁總統當選，那麼我們和中國大陸的衝突，將是主權／認同概念上的衝突，這和連宋當選的情形不一樣。連宋如果當選，我們還是會和中國大陸產生衝突，而這種衝突是非主權性質的，可能表現在經濟產業層面上；但若陳水扁當選，則衝突會變成是主權性質的。我想，這個議題的走向，未必是陳總統想要和中國大陸作主權攤牌，而是從北京的角度、從胡錦濤的政治處境、從江澤民擔任對台小組負責人來說，基於他們在北京的政治利益，勢必會想辦法來解決台灣問題，否則十年和平對台灣的政策基調，會落得全盤失敗，所以北京非面對不可。這個情況其實來自中國內部的政治壓力，而不是台灣內部的政治壓力。

在國際框架中看待中國問題

回頭來談談大陸，一如陳教授所言，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，中國已經變成亞洲的霸權了，而且影響遍及軍事、經濟、國際政治等方面。台灣現在有些人認為中國內部有非常嚴重的經濟風險，市場可能會崩潰，但是實際上，當它在國際上佔有如此大份量的時候，它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關鍵；也就是說，萬一發生問題，也會被視為國際經濟整體的問題，而不是中國單一的問題，所以國際間會盡很大的力量給予協助，而且力保不再出錯。由此可見，中國崩潰的機率將會變得非常低，甚至當全世界和它並肩一起解決問題之際，台灣更不得不面對這股無可抗拒的影響力，而且這股影響力還會隨著自由貿易協定、CEPA、東協加一加二加三不斷擴張，中國甚至可能用國際組織、體制性的方式，確定它在亞洲霸權的中心地位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它也逼迫了台灣現實面對中國崛起的問題。

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，過去四年，由於中國的存在，以及本土認同和「中國」符號之間的拉扯，結果導致台灣除與巴拿馬簽訂FTA外，沒有和任何一個主要西方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，原因所在多有，其中一項也跟認同有關，例如新加坡只承認我們使用Chinese Taipei，可是國安會堅持要用Taiwan，所以最後FTA簽署破局。台灣和其他國家同樣面對

全球化的困境，又加上面對中國的困境，所以過去四年全球化的腳步非常緩慢，自由化、國際化的指標相當低，例如國際認證、金融國際化進展一場糊塗，所有金控合併都是國內自己吃掉自己，赴陸投資資金回流困難等。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，就是在這種政治認同困境之下，兩岸關係會不斷的 up and down，來來回回衝突，可能一直等到中國崩潰、台灣解脫，或是台灣社會像滿清末年受盡各種教訓，最後不得不面對，才有可能停止。

認同的拉扯，對台灣已經形成一個很難解開的結，所以我對台灣處理中國問題充滿悲觀，也認為台灣二〇〇四總統大選不會完全解決這個問題。連宋如果上台，也許很快開放直航，馬上能和中國大陸市場接合，但另外一個力量立刻也反撲回來，這個力量可能是失業的力量，或是反全球化、反中國認同的力量，更可能是房地產利益的力量，全部都會集結在一起。台灣過去幾百年的歷史，丟不掉中國的夢魘，未來一百年恐怕還是丟不掉，無論文化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。政治領導人選擇與中國對抗，就是選擇讓國家自殺；政治領導人選擇與中國接軌，也許國家沒有自殺，但他自己卻很快地被毀掉，這是我自己過去幾年的觀察。